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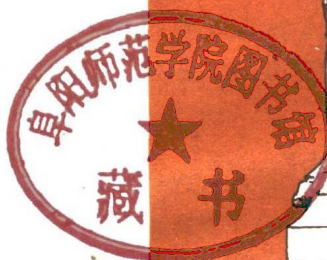
裴多菲文集

第一卷

**PETŐFI
SÁNDOR
MŰVEI**

上海译文出版社

登录号	094545
分类号	I 15.14
种次号	001



裴多菲文集

第一卷



200713763



00891417

兴 万 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PETŐFI SÁNDOR
ÖSSZES MŰVEI

本书根据 Akadémiai Kiadó
Budapest, 1951 年版第 1 卷译出

裴多菲文集
第一卷
兴万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 插页 5 字数 287,000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 册

ISBN 7-5327-1546-9/I·918

定价: 23.60 元

裴多菲的生活与创作

裴多菲·山陀尔(1823—1849)是匈牙利十九世纪的伟大的爱国诗人，是匈牙利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革命的杰出的战士和歌手。他以诗歌为武器，为了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同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者作战，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他的诗歌作品不仅在匈牙利，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被压迫、被侵略的弱小民族和国家里，得到广泛的流传。裴多菲诗歌传播的领域，直到今天还在不断扩大，他的诗被译成五十多种文字出版。在中国，提到裴多菲就会联想到鲁迅，因为他是我国最早评介裴多菲的人。鲁迅在一九〇七年所著《摩罗诗力说》第九节中，就以敬仰的心情，推崇他“所著诗歌，妙绝人世”，称赞他“为国而死”的革命精神。伟大的人民作家茅盾是我国翻译裴多菲诗的一个人。远在一九二一年他就以雕冰的笔名翻译了裴多菲的最著名的政治抒情诗《匈牙利国歌》（即《民族之歌》），发表于同年十月十日上海出版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栏中。这是裴多菲诗的第一首汉译文。由沈泽民翻译的抒情诗《唯一的念头》即《一个念头在烦恼着我……》，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四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四号。三年后，即一九二五年一月的《语丝》周刊发表了鲁迅翻译的裴多菲的五首诗，流传很广，影响较大。后来，革命诗人白莽翻译了他的评传和九首诗，其中《自由与爱情》一诗，受到我国广大读者的欢迎。由于鲁迅与茅盾带头介

绍，裴多菲早已成为我国读者所熟悉的外国诗人之一。

诗人的家世与少年时代

裴多菲·山陀尔于一八二三年一月一日出生在多瑙河与蒂萨河之间阿伏德大平原上的吉什—克洛什村。他原来的姓名叫彼得罗维奇·山陀尔，从一八四二年开始，以裴多菲·山陀尔笔名发表诗歌作品。父亲彼得罗维奇·伊斯特万(1791—1849)出身于斯拉夫民族，自幼贫苦，做屠夫为生；母亲赫鲁兹·马丽亚(1791—1849)出身于马扎尔民族^①的一个农奴家庭，在出嫁前做过洗衣妇和女仆。父亲性情倔强，对孩子的教育非常严厉；母亲是一个身材不高的黑发女人，一个温顺的农妇，她娴静、温柔、忧郁，特别喜欢孤独。

根据十九世纪初期匈牙利的社会特点，裴多菲的家庭属于下层劳苦人民。彼得罗维奇·伊斯特万按社会法律的规定，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最底层的农奴。正如裴多菲于一八四八年所著《老旗手》中回忆他父亲时写道：“连他死后的一小块坟地也说不上属于他自己。”裴多菲童年时的家境几乎处于赤贫状态。奥地利皇室对匈牙利进行新的勒索并加重赋税，本国的封建统治者也就极力将苛捐杂税强加于农奴身上。

一八二四年十一月裴多菲两岁时，他的家便迁居到菲尔艾吉哈兹。这是一座不大的只居住匈牙利人的半农业小城。在这里，诗人的父亲开设肉铺。他当屠夫，杀猪宰羊，赢得较多利

^① 按照匈牙利文的音译，“匈牙利”这个名词应译为“马扎尔”。匈牙利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马扎尔是最大的一个民族。

润，日子很快就富裕起来。裴多菲一直把这座小城当作他的故乡，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提到，因为他在吉什—克洛什村只居住两年就移居到这座小城来，在这里度过自己的童年，留下他幼年时期的美好记忆。

一八二八年裴多菲五岁，父亲把他送进菲尔艾吉哈兹小城的学校，但不久又转学到克奇克梅特城读书。他在这里除了学习匈牙利语，还学习拉丁语。彼得罗维奇对自己的儿子抱有更大的希望，希望把他培养成一个牧师或者商人。对于一个只有七岁的儿童来说，远离家乡和父母，食宿于学校，该是何等困难啊！

一八三〇年彼得罗维奇全家迁到萨波德萨拉什，父亲把他接回家，他在本村的小学只读了一年书，一八三一年裴多菲又被父亲送到萨尔山特列林兹小城的学校，专门攻读拉丁语。裴多菲远离家乡和双亲，他心情沉重，养成了一种喜爱孤独、不爱交际的性格，只是苦读书、专心写诗作文。童年时期，裴多菲相当聪明，学习成绩优异，特别是他有掌握语言的才能。除了匈牙利语以外，他还能用斯洛伐克语自由交谈。

一八三三年裴多菲十岁时，彼得罗维奇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把儿子送进布达佩斯最好的学校学习拉丁语和德语。在布达佩斯学习期间，裴多菲厌烦校方的拉丁语和神学课。他日夜攻读文艺作品，其中包括拜伦、雪莱以及海涅和贝朗瑞的诗歌。此外他对戏剧产生强烈的兴趣。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到布达佩斯民族剧院看戏，成了剧院的常客。这一时期，裴多菲的学习成绩突然下降了。这使裴多菲的父亲很恼火，他认为儿子进入大城市，受到了上流社会恶习的影响，便决心让儿子离开繁华都市。裴多菲在布达佩斯只学习了一年，又被父亲送到多瑙河岸边的奥

赛德的学校学习。他在奥赛德学习了三年，由于阅读欧洲许多进步书籍和匈牙利古典文艺作品，他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他的这一段艰苦生活，在《旅行书简》中有较详细的记述：

一八四三年冬末至一八四四年春初，正是寒气袭人的季节，我在这城里度过了极其艰苦的岁月。我挨饿受冻，落得孤身一人，病倒在一位穷苦、善良的老太太家里。感谢上帝！我没有死去。如果不是她对我的怜悯，分担我的痛苦，我一定会死亡。亲爱的朋友，如今这封信，我也只好从另一个世界给你发出了。那时候，我是一个被抛到人世之外的年轻的流浪演员，上帝和世人毫不理睬我，对我冷若冰霜。三年半以前，我在剧院里扮演过配角，引不起任何人对我的注意。后来我走下舞台，来到广大的人民群众中间，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员。只有在这个时候，我的耳边才响起阵阵热情的、雷鸣般的呼声：“裴多菲·山陀尔万岁！”

裴多菲渴望成为一个演员，渴望通过舞台的艺术生活向人民群众宣传先进思想。裴多菲想当演员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一八四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在佩斯民族剧院上演莎士比亚的名剧《李尔王》时，他扮演剧中一个傻子的角色。关于这次演出，裴多菲写下了《我第一次扮演的角色》的八行小诗。

我成了演员。第一次

我登台表演，

在舞台上我第一次

露出我的笑脸。

我表演得非常得意，
微笑从我的心底涌出；
啊，我不知什么缘故，
表演时我失声恸哭。

裴多菲参加了流浪剧团。通过步行、乘驿车和雪橇，他几乎游遍了半个匈牙利的江山。他夜宿在酒店、小客栈、军营、露天帐篷和多瑙河桥头下面。这使他有接触下层劳动群众，了解他们的悲惨生活和命运。在流浪剧团里，裴多菲开始搜集民歌。他采用劳动人民的口语运用民歌形式开始创作诗歌。在十九世纪初的匈牙利诗坛上，当时流行着拉丁语诗，这种诗体格律繁严、语言晦涩，脱离劳动人民。裴多菲希望通过搜集民歌，突破拉丁语诗的限制，采用民族语言，在诗歌创作上探索出一条健康的道路。他认为民歌是劳动人民的创作，有着真切的感情，但是民歌必须加以提炼，提高到真正艺术珍品的水平。裴多菲尝试的结果，证明他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在这种创作思想指导下，他陆续写下五十多首民歌体诗篇。民歌赋予裴多菲以新的生命，哺育着诗人成长。就是到他后期，他在战场上完成的战歌，同样保留着他前期采用民歌体进行创作的优点。

助理编辑时期

鲁迅于一九〇七年在《摩罗诗力说》中评论裴多菲时说：“浪

游变易，殆无宁时”，这是对诗人少年时代性格的全面概括。一八四三年年底，裴多菲衣衫褴褛，带着一卷诗稿，踏上了通向布达佩斯的大路。他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这卷诗稿上面。他想卖掉它，换取几片面包。在严冬季节，他独自远行，离开德布勒森城，奔往京城。举目不见一个人影儿，雨点打在他的脸上，同眼泪汇合，冻成冰凌。经过一个星期，裴多菲终于到达布达佩斯。他决心拜访当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魏勒斯马尔蒂。他把诗稿交给了魏勒斯马尔蒂，意想不到的的是他的诗受到魏勒斯马尔蒂的赞赏，并介绍给当时的民族丛书社，他的第一本诗集出版了。

一八四四年一月，裴多菲担任《佩斯时装报》的助理编辑。他的流浪习性稍有改变，漂泊生活渐趋稳定。他开始组织佩斯的激进青年努力从事政治与文学研究。裴多菲所领导的以毕尔瓦什咖啡馆为活动中心的青年，后来形成“三月青年”的组织。他们在佩斯起义中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裴多菲不仅是这个组织的领导者，而且是这一批青年人的精神领袖。

这一时期，裴多菲作为瓦豪特·依姆雷的助手，和他共同从事《佩斯时装报》的编辑工作。这个刊物并非纯文学杂志，为了迎合妇女们的需要，经常刊登时髦服装样式，宣传巴黎妇女所追求的服装改革。它是一个带有封建性质、崇拜欧洲文化、轻视民族文学传统的守旧派刊物。裴多菲做了这个刊物的助理编辑，只是由于生活所迫，为了有固定的薪金收入。更主要的是，裴多菲有了一个安静的写诗的环境。裴多菲精力充沛，意志坚强，对未来抱有必胜的信念。他期望以《佩斯时装报》和科苏特创办的《佩斯新闻》为阵地，向本国的封建复古派和德国的反动浪漫派作家们进行斗争。在他担任助理编辑的一年中，他受到封建复古派

作家和自由妥协派作家们的疯狂攻击。在此期间，裴多菲写下了一系列政治抒情诗，例如《爱国者之歌》、《贵族》、《给在国外的匈牙利人》、《为什么我不出生在一千年以前？》、《奴隶国的儿子》等。这些抒情诗标志着裴多菲革命诗歌的开始。他在《爱国者之歌》一诗的开头，就表达了他热爱祖国的情感：

我是你的，是你的，我的祖国！
这颗心，这灵魂；
假如我不爱你，我的祖国，
我能爱哪一个人？

裴多菲把自己比喻成教堂，把祖国比喻成神坛，在他的心灵中虔诚地供奉。在这首诗中诗人发誓，他的爱国思想永远不变。一八四四年一月，裴多菲在德布勒森的一所草棚里写下了第一首政治讽刺诗《贵族》，开始向贵族地主阶级进行挑战：

把那恶棍吊上鞭刑柱吧，
用棍棒把他的罪恶清算，
他偷，他抢……鬼知道
他还干了些什么勾当。

匈牙利启蒙运动时期的进步作家也创作过揭露贵族地主阶级贪婪、落后、愚昧的讽刺作品，但是他们的目的在于教诲他们如何改正或者克服，以求得进步。裴多菲和他们完全不同，他号召奴隶们起来同贵族地主阶级进行血战。

这一阶段，是他采用民歌体写作和搜集歌谣最丰收的时期。他写下了《谷子成熟了》、《我走进厨房》、《老板娘爱山盗》、《傍晚》以及被鲁迅引入《七论“文人相轻”——两伤》的杂文中的《我的爱情并不是……》等民歌体诗篇，这些诗歌被音乐家谱曲传唱，深受匈牙利人民的喜爱。裴多菲用流畅的语言、和谐的音调，把大自然的美、草原上的牧羊人、多瑙河与蒂萨河畔的渔夫、田野里劳动的男女青年、巴空尼大森林里的山盗，都描绘在他初期采用民歌体创作的诗歌里。他在农村小酒馆、大车店里朗诵自己的诗，听取劳动人民的意见和接受他们的审查。他前期的许多诗篇，都经过这种考验之后才最后定稿。他把下层劳苦大众的反应作为衡量自己诗歌的重要标准，努力使每一首诗从内容到形式都为群众所喜爱。虽然裴多菲在早期的尝试中也有过失败，但是他认定民族诗歌发展的方向，毫不灰心地向前探索。为了创立民族诗歌，为了实现“诗歌革命”的理想，裴多菲不顾反动作家们的叫嚣，充满信心地宣布：“……将来诗歌本身也许会把我带进最完善、最纯真的匈牙利诗歌的形式中去。”（一八四七年《诗歌全集序》）除了民歌体抒情诗之外，这一年他完成了两部长诗，一部是讽刺诗《农村的大锤》，另一部是用六天写成的《雅诺什勇士》（即孙用译《勇敢的约翰》）。

一八四四年冬季，裴多菲爱上了一位十五岁的少女乔包·爱德尔卡。他们一见钟情。诗人写下初恋阶段的爱情诗，献给这位少女：

姑娘，你可见过多瑙河？
它从一个岛的中央流过；
我说你那娇美的面容，

轻轻荡漾着我的心波。

绿色的落叶从岛旁，
被卷入青青的水浪，
我说你那希望的浓荫，
悄悄撒在我的心上。

——《给爱德尔卡》

可是他们相识不久，乔包·爱德尔卡突然患病，于一八四五年一月七日死去，被埋葬在盖莱伯斯陵园里。这给诗人精神上很大的打击。乔包·马丽亚在她的《回忆片断》中这样记载她妹妹乔包·爱德尔卡死后情形：“……圣诞节刚刚过去两周，爱德尔卡死了。两位诗人——我的丈夫和裴多菲将她埋葬。裴多菲在灵柩前痛哭失声。安葬了爱德尔卡以后，裴多菲在我们家里住了十四天，他住在停放过爱德尔卡尸体的房间，也就是睡在爱德尔卡生前所睡的床上。”在这位清秀的少女逝世后的两个月里，裴多菲经常来到盖莱伯斯陵园，并且写了许多悼念爱德尔卡的诗篇。同年三月二十日，出版了诗集《爱德尔卡坟上的柏叶》。诗集共收三十四首短诗。诗人在这些诗中深切表露了对初恋少女爱德尔卡的天真的怀恋。这些诗同前辈诗人的坟头诗有所不同，在裴多菲的诗中有控诉时代的激进的成分。在《爱德尔卡坟上的柏叶》组诗中，裴多菲热切地表露了对这位少女的纯洁的爱情的向往、追求与怀念，并以浓重的伤感哭诉少女过早夭亡；同时诗人赋予理想中的爱情以一种美好的浪漫色彩。例如《唉，葬仪的钟响了！》、《古老的大地……》、《枝头的花瓣纷纷地

飘落》以及被我国革命诗人白莽译成汉语的《雪呵，你是大地的寿衣》等诗，都属于这一类作品。

一八四五年四月一日裴多菲开始了他的长途旅行。他乘驿车从布达佩斯启程，向喀尔巴阡山脚下进发。他几乎游历了半个匈牙利，于同年六月二十四日返回布达佩斯，历时近三个月。他这次旅行的重要收获是完成了散文作品《旅行札记》。旅途中，裴多菲受到劳苦人民的热情款待。经过北部山区埃伯尔耶什、吉什—马尔克山城时，青年男女排着队伍，奏着音乐，举着火炬，向他表示欢迎。由于裴多菲的诗获得读者的高度评价，人们都以结识这位新诗人为荣。当他旅行到利姆—松包特和戈摩尔州的时候，恰逢大选，他被选举为上诉法官。他在诗友盖雷尼和顿姆巴的家里住了一个月光景，他们讨论了民族诗歌的发展方向问题，并进行赛诗和参观古迹等活动。他参观了匈牙利北部的菲莱克、萨莫什克、萨尔沟城堡的遗址，听到许多山民关于古代反抗土耳其人的战斗传说。这一切增添了裴多菲在旅途中的兴致。他在《旅行札记》中写道：“除了人民，哪些诗人能有这样丰富的想象呢？”一八四六年，他写下长篇叙事诗《萨尔沟城堡》，这是此次访问三座城堡遗址的重要收获。

在《旅行札记》中裴多菲不仅记载旅途见闻，而且借题发挥，抨击了资产阶级议会选举中地主资产阶级政客们钻营禄位、搞投机、拉选票等卑劣手段；同时他对当时文艺界浪漫派作家的矫揉造作与虚弱无力，对封建复古派作家的墨守成规和陈词滥调，都作了有力的批判。写作该篇游记时，裴多菲年仅二十二岁，他那时的思想尚未成熟，未经受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战斗洗礼，缺少丰富的生活和战斗经历。游记的某些段落或对个别事件和景物

的描写并无深刻的含义，有些地方显得油滑，甚至有自然主义的色彩。这是该篇的薄弱之处，反映出作为杰出诗人的裴多菲早期创作中的缺点。

裴多菲结束北部高地一带的旅行回到布达佩斯以后，应剧作家艾格莱希·戈包尔(1808—1866)的邀请，创作了剧本《卓尔特·马尔奇》。由于这个剧本不适于舞台演出，民族剧院委员会没有通过这个剧本。裴多菲一气之下，将手稿烧毁。匈牙利的进步作家和评论家们总为诗人的这一“愤怒”和“激动”所造成的无法弥补的损失而感到惋惜。

裴多菲少年时期的流浪生活给他带来无穷的困苦，但是这也使他有从各方面接触穷苦大众。一方面他看到京城的光辉、富丽和奢华，贵族地主的专横野蛮，投机商人的唯利是图；另一方面也看到流浪在多瑙河岸边的乞丐、穷人的黑面包和孤儿寡妇的泪痕，劳动人民的汗水和疲惫的人影。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裴多菲把布达佩斯看成两个阶级的生活矛盾表现最为鲜明、最为尖锐的城市。一切矛盾都集中在这个古老的都市里。裴多菲以劳动人民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古老的京城，再加上他本人亲身遭受剥削的重压和穷困生活的煎熬，所以他把自己和那些享福作乐的贵族地主们对立起来，沿着平民诗人的道路前进，以平民歌手的姿态出现，无情地揭露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愚昧无知、不求进取的贵族老爷们。这一时期，裴多菲诗歌创作中的鲜明的民主倾向和反抗旧世界的激进因素增多了。裴多菲越来越感到作家责任重大，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坚定地前进，同旧势力展开斗争。他一再强调：“每一个诗人都要同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前进！”（《致十九世纪的诗人》）同时他又善于团结他

周围的作家，引导他们为劳苦大众进行创作。例如被鲁迅引入《诗歌之敌》和《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序言中的裴多菲的诗《题B·Sz·夫人照像的诗》（即《题在瓦·山夫人的纪念册上》），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鲁迅将这首诗译成了散文：“听说你使你的丈夫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为他是苦恼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吧，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来。”这首诗是裴多菲题给瓦豪特·山陀尔夫人乔包·马丽亚的。裴多菲批评了这位女诗人在婚后沉醉于个人的所谓幸福当中。鲁迅一再引用这首小诗，就是因为当时中国现实社会中的一部分作家沉溺于个人的狭隘圈子里。

一八四五年夏天，在爱德尔卡逝世半年以后，裴多菲又爱上一个地主的女儿麦德尼阿斯基·伯尔娜。她有着惊人的美丽面容。只因为她的美，使裴多菲在爱德尔卡的爱情悲剧之后，摆脱了精神上的苦恼，使爱情女神在诗人的心灵中苏醒。这位骄傲的庄园少女对裴多菲这样一个全国闻名的诗人是羡慕的。她爱裴多菲的诗，但并不喜欢裴多菲这样一个瘦弱多病的穷苦人。裴多菲自己十分清楚，他与这位“乡下美女”没有任何共同语言。但是，裴多菲迷恋她的美，写了许多爱情诗献给她。一八四五年秋天，出版了《爱情的珍珠》，共收入爱情诗四十首。在这四十首诗当中，也有一些精品，例如《我愿是树，假如……》、《我的爱情在一百个形象中》、《假如上帝……》以及《我梦见战争来临》等等。

第二次出游，《云》组诗的创作

一八四五年至一八四六年春季，裴多菲的思想正处于“淡淡

的哀愁”时期。这一阶段，他完成了激动人心的《云》组诗，共写了六十六首。这些短歌具有欧洲革命风暴来临前的时代的特征。

这一时期，正处于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的前夜。在匈牙利，异族加紧侵略，国内的阶级压迫日益严重。诗人思想上感到苦闷、彷徨，看不到民族的前途。裴多菲的思想几乎濒于“绝望”的边缘。《云》组诗充分表现了裴多菲的悲观、矛盾、愤慨和痛苦追求的心情。那时诗人向往的法国革命在匈牙利无法实现，民族衰落，前途暗淡，再加上他对爱德尔卡的爱情又遭受打击，使他的思想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哀愁”的浮云。他在写作《云》组诗的后期，即一八四七年七月十七日，他从萨特马尔写给诗友盖雷尼·符利捷什的信中，写下这样富有深刻哲理的话：“绝望之为虚妄，正如希望相同”。鲁迅于一九二五年作《希望》篇时，曾有两处引用了裴多菲的这句话，意思是说，绝望的不真实、不存在，正如希望的不真实、不存在是一样的。按照匈牙利文直译，可译成：“不管是希望还是绝望，都是骗人的。”

一八四五年或者稍后一段时期，尽管裴多菲的思想发展濒于“绝望”的边缘，但是他仍然没有停止同封建势力的斗争。感伤的诗他写过，锋芒毕露的政治诗更是他创作的主流。他写下《匈牙利的贵人》讽刺诗，同时也写下了赞美先人丰功伟绩的颂诗《祖国颂》。

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裴多菲在同旧制度斗争中感到势单力薄，对胜利感到渺茫，这说明诗人前期富于浪漫主义的幻想，当他接触到匈牙利的现实社会之后，必然会产生一种失望与感伤。

一八四七年裴多菲致力于研读欧洲哲学。在掌握了黑格尔

左派的辩证法之后，他开始运用辩证的观点分析“绝望”与“希望”的关系。裴多菲并不否定“绝望”，也正如他不全盘肯定“希望”一样。他认为在“绝望”中闪耀着希望的火花，在“希望”中同样潜伏着绝望的恶运。这是裴多菲思想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从一八四六年春夏之交开始，裴多菲确定了以政治诗为主的诗歌创作新方向，号召奴隶奋起砸断铁锁链：

我梦见流血的日子，
它将世界全部毁灭，
在旧世界的废墟上，
建设起崭新的世界。

——《我梦见流血的日子》

一八四六年春季，裴多菲结束了他短暂的“淡淡的哀愁”，并以实际行动向革命迈进。他在布达佩斯组织起“十人协会”和匈牙利第一个作家团体“青年匈牙利”，并且出版了宣传民主主义思想的刊物《生活景象》。“十人协会”和作家协会的建立，增强了裴多菲从事革命活动的力量。他的“孤独”与“绝望”情绪逐渐减轻了。

一八四七年七月，裴多菲从布达佩斯启程，开始他的第二次长途旅行，同年十一月十一日返国布达佩斯。这次旅行他完成了第二部重要散文作品《旅行书简》。全篇由二十封信组成。诗人此次出游的原因有四：第一，应他的朋友盖雷尼·符利捷什的邀请，讨论关于民族诗歌的发展方向问题；第二，时处一八四八年革命前夜，他借机出游，以了解下层革命的力量；第三，他同森